

纪念廖山涛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微分动力系统研讨会发言

廖章林

今天，北大数学学院举办微分动力研讨会，纪念廖山涛先生诞辰 100 周年。受数学科学学院的热情邀请和推荐，我作为廖山涛的亲属和特邀嘉宾出席会议开幕式感到非常高兴。此时此刻，我向数学科学学院表示我的衷心的敬意。也向出席此次开幕式的来宾表示我的衷心的敬意。也向在网上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敬意。

一九五六年，我的父亲回国。国家安排他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生活在湖南衡山乡下的奶奶，表姐和我也随迁到北京。我们一家被安排在北大蔚秀园居住，当时的居住房屋已被拆除改建为北大幼儿园。

在我的印象中全家相认时，奶奶指着一个高高的年青人要我喊爸爸，我感到十分恐慌，当看到那个人殷切的目光望着我时，在奶奶、妈妈的催促下，怯怯地喊了一声爸爸，对方显得很欣然并亲切地摸了一下我的头，我的惊悸不安的心也很快平静下来。

我在湖南衡山上的是农村小学，那里的教学水平与北大附小的教学水平差距十分大，我的课任老师兼班主任老师在测试我的实际水平后向我父亲建议让我留一级，但我的父母都不同意，坚持让我跟班学习。每天下课回家，父亲让母亲给我做听写并背诵课文，这样一直坚持到期末，我顺利地通过了期末考试。

父亲回国后的那几年生活是相当美好的，父亲总是坐在屋里写东西，打字，看书。他没有星期天，没有假期，即使是学校的寒暑假他也在常常夜深人静时只有他的屋子里灯亮着，他睡得很晚，我们小孩早晨起床时，妈妈总是叮嘱我们不要说话，上学出门时要静悄悄，不要打扰他，让他多睡一会儿。据妈妈后来告诉我，在这期间爸爸写了多篇高质量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校刊和中科院期刊上。

一九五九年之后的几年，中国进入了经济困难时期，粮食要用粮票，穿衣服要用布票，很多日用品都要用工业券去购买。中国实际上转入了战时经济，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着如何解决实际工作困难去服务。我的父亲只好丢下他多年研究的拓扑学转而去开辟与国民经济关系很深的刚刚兴起的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为了更多地了解国外研究情况。他每天早晨清早便乘公交汽车从北大西校门出发到现在化工大学旁边的中国科技情报所去查国外资料，并用笔和纸用心记下。很晚才回家。国家为克服困难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学校响应这些口号

派他去大庆和大寨学习。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星期。希望他从大庆和大寨中汲取力量。每次学习完回家稍加休息便又投入微分动力系统的研究。记得有一天，已经中午过后很久了还没有开午饭，妈妈要我们等着爸爸，爸爸正在睡觉。妈妈要我们悄悄地不要讲话，她告诉我们，爸爸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一直在考虑问题，早晨刚刚睡着，不要搞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艰难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到了六四年六五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起来，据母亲告诉我，父亲在这几年里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正要高歌猛进时，没有想到的是，一九六六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研究工作也中断了，直到一九七八年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他才恢复正常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他曾经去过江西波阳湖北大分校农场养过猪，还被分配去研究过液压射流元件，他也关注过人造小太阳（热核聚变）的控制问题。这些事与理论数学研究是无关的，可以这样讲，他整整中断了十多年对理论数学的研究，而这十多年应该是他做学术研究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创造力最佳的时刻，取得更多成果的时候。

我的父亲对人友好、热情、真诚。无论是对老师，对学生，对朋友，对邻居都是这样。江泽涵先生是我父亲学习数学的导师，在抗战时期，江先生作为拓扑学在中国的开拓者已经名满天下，当时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江先生在那艰苦岁月中对我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父亲铭心难忘，无论何时，我父亲见到江先生以弟子礼侍之。在人们互相揭发批斗的年代，江先生有时上我们家，父亲总是让我们亲切地喊江师爷。向江师爷问候。

父亲对时间管得很紧，他总是忙碌，不希望我们打扰他，但当他的学生找他时，他从不拒绝，有时谈得兴趣盎然时，他还要留客吃饭，当然他最高兴的事是与朋友聊数学，已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故去的老师董怀允先生经常去我家找我父亲聊数学，有时一聊就是半天，董怀允先生的离世让他很伤感，很多年都挥之不去。

父亲对儿女教育非常重视，我的小孩出生后，他嘱咐我们要把小孩带好，我们带小孩去探望他，他非常高兴，经常事先买些小玩具给他。等到小孩稍大后，父亲就买儿童读物送给他，有时还亲自带着孙子去中关村书店挑书。有一年年终，人们互寄有奖明信片，我们收到小孩爷爷奶奶送给孙子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大侠，祝你中个大奖”落款：爷爷奶奶，这张明信片虽然没有中奖，但我们都明白，这是爷爷奶奶在鼓励孙子和对孙子未来的期望。我们的小孩上小学二年级时，他被一个报社选中为儿童小记者并组织这些小记者上天安门城楼参观，我们跟父亲

和母亲说起这事，父亲鼓励孙子说，咱们家只有两个人上过天安门，我说的是受邀请上天安门，自己买票上去不算数。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身体差了，但他关心孙子的教育，怕自己死了孙子上不起大学，于是在银行存了一张定期存款，并在存单背面落款廖侠上大学学费。

我的父亲是一九九七年去世的，在他去世之后的二零零三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在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了她留下的遗物，其中有一个遗物是一个小铁盒，打开一看，里面装着粮票和工业券，数了数超过千斤，一部分送出去了，余下部分我打算捐给北大做为纪念，在那个粮票比钱重要的年代，两位老人缩衣节食，为国家省下了那么多粮食。我的父亲热爱祖国，由于他对祖国的热爱与对亲人的眷顾，才使他告别了他的导师 N, E 斯廷罗德，毅然决然地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离开回到中国。

最后，我再次向出席会议的尊敬的嘉宾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向网上参加会议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此次学术交流会取得成功。